

读经解典

人文卷

王义军 主 编

王 文 副主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读经解典

人文卷

王义军 主 编

王 文 副主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范红延
装帧设计：智兴设计室

责任校对：韩秀天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经解典. 人文卷/王义军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7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ISBN 978-7-5130-0368-1
I. ①读… II. ①王… III. ①人文科学—著
作—简介—世界 IV. ①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894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读经解典·人文卷
DUJING JIEDIAN (RENWENJUAN)
王义军 主编 王 文 副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026

印 刷：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24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字 数：209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8.5

印 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ISBN 978-7-5130-0368-1/Z·459 (3312)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读经解典·人文卷

主 编：王义军
副 主 编：王 文
执行主编：范红延

丛书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竹青	马 铮	王义军	王 文
包锡妹	张子宏	张 跣	李秀峰
肖 峰	吴鲁平	陈树强	范红延
林 江	林 维	郝瑞庭	戚 鸣

本书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闽梅 王义军 王 文 雷永生

人文经典、人文学科与 人文教育（代序）

■ 王义军

目前，人文经典阅读受到冲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文经典，读还是不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地位也一路下滑。以大学招生为例，最近10年，北大、清华每年揽得的高考状元多进入了金融经管各科，鲜见高分考生选读文史哲的。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也使得以人文学科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课程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当今社会，传统的“读书无用论”已被扬弃，知识经济时代，任谁都不敢轻视工具性知识的价值，因此，人们一般不再笼统地认为读书无用，但确有相当多的人认定“读人文书籍无用”。在这一新的“读书无用论”冲击之下，“读书只为稻粱谋”，人们的阅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左右，并直接影响到了大学的办学理念、专业和课程设置以及学生培养的各个方面。

人文经典的阅读是否可有可无？人文学科的沦落是应该的吗？人文经典与人文学科关乎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关乎大学的本质。现代大学的功能最初就起源于包括语言、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功能。大学的这一本质功能如果没有了，大学还是大学吗？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现代大学与现代社会是互相发明的，一流强国是与一流高等教育分不开的。教育的方向关乎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教育方向上的偏差迟早会反映到社会中来，成为社会问题。现在，当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规则不断地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侵入大学校园，有用与无用越来越多地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大学已经出现了失去其本质功能的迹象。中国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对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追逐成为流行的社会风气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具有引领社会责任的大学如果在这一流行风中不能把持住自己，社会发展走弯路将是必然的。

人文教育的功能是建立在人文学科独特价值基础之上的。正如许多学者了解的那样，从世界范围来看，人文学科的危机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近代早期就开始了。在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关于“两种科学”、“两种文化”的讨论和争论便不绝如缕。在经历200多年科学主义世界观和科学主义文化的统治之后，最近100多年来，随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逐渐剥离，人文学科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复苏，形态各异、方法多元的各种主义、思潮不断涌现，在这场文化变革中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化之后的西方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在20世纪能够自我调整、自我纠错并继续保持生机的思想资源。这一历史过程说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不仅为培养健全的个体人格、提升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必需，而且负有引领和改变社会，把握社会前进方向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正别无选择地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当代中国，发生于100多年前西方文化体系中的这场“学科危机”前前后后的情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大致说来，从17世纪后半叶近代科学革命开启至19世纪末，是自然科学凯歌行进的200年，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进而一统人类思想文化观念天下的200年，也是人文学科被挤压、被边缘化的200年。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既标志着人类科学时代的开端，也意味着人文学科危机的正式开始。此书是人类自然知识的首次大综合，以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核心所构造出来的经典力学体系，既圆满解释了地面物体的运动，又成功描述了天体运动，打破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天地截然不同的信

条，描绘出一幅壮美且统一和谐的自然图景。“经典力学理论体系的完美和实用威力的强大使物理学家深信，天地四方、古往今来发生的一切现象都能够用力学来描述。只要给出系统的初始条件，就能毫无遗漏地把握它的因果性链条。”^①此后的200年间，经典力学不仅是科学解释的最高权威和最后标准，是“真理”的同义语，而且逐渐成为主导人类精神活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①李醒民著，《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页。

18世纪，力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始侵入“人和社会”这一人文学科的传统领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力学原理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整个自然界，而且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可以解释人的精神以及人的思维活动。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继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观点之后，他提出“人是机器”，认为人只不过在结构上比动物更精巧而已。同其他动物相比，人有心灵或理性，但他认为心灵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它只不过是精细的物质组织的产物，无非是“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产生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成？”^②19世纪法国思想家、实证哲学创始人孔德则将力学概念及其方法论系统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并创建社会学。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孔德提出，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必须遵守“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换句话说，人类的精神受本性的支配，在对它的每一项探讨中，都相继地使用了三种性质基本上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哲学方法：首先是神学方法，其次是形而上学方法，最后是实证方法。”^③在孔德看来，在实证阶段，人类的理智已充分发展，承认绝对知识不可求，于是不再探讨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追究本原，只是力图去把握现象中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即发现在现象中起作用的规律，同时，对事实的解释严格限定在现象范围内。因此，科学就是一切。

②[法]拉梅特里著，《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6页。

③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26页。

19世纪是科学大发展的世纪。经典力学之后，自然科学进入到分门别类研究的时期，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等相继从广义的物理学或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越发深入而具体，经验和实证方法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确认，世界的物质本性也因此而得到进一步体现。到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差不多已完成对哲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全面入

侵，“物质”成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精神”成为新兴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的起源与本性成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全面流行，被认为是获得“真理”的不二法门，新兴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法律等学科的学者都纷纷转向实证主义。经验和实证方法的背后是感觉主义认识论，这一点到19世纪80年代由奥地利物理学家、科学思想家恩斯特·马赫系统地阐释出来。19世纪后期，力学世界观受到科学发展的冲击而出现衰落迹象，马赫是最早洞察到这种迹象的人之一，为挽救科学世界观的危机，并为各门学科谋求一个统一的基础，他选取了一条纯粹经验主义的道路，力图从科学中排除一切不能由经验证实的所谓“形而上学”命题。马赫指出，尽管牛顿一再声明“不做假设”，但还是引入了超经验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运动等概念，他的超距作用式的“万有引力”学说也只是一种假说，本身并无法感知。马赫认为，在牛顿力学中，应该把基于经验的部分与任意约定的部分区别开来，自然的性质不能借助于所谓不正自明的假设来捏造，而只应该从经验中引出。他断言：一个超出认识范围的东西，一个不能被感觉到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意义的。在他看来，凡科学命题，必须是经验上可证实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命题必须能够还原为关于感觉的命题，换言之，所谓科学理论无非是用理论术语表达出来的感觉。因此，表面看来，科学家面对的是外部世界，实际上面对的是自己的感觉。作为感觉对象的物体和作为感觉主体的自我都是一系列感觉的“复合体”。物体和自我都只是纯粹的思想符号，真实存在的只是感觉。作为传统哲学支柱的“物”和“我”，其实都是多余的假设，是“形而上学”的根源，应该剔除。而“自我”一旦消失，人文学科赖以立足的所谓“精神领域”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19世纪后期人文学科遇到的危机已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丧失自己研究对象的危机，是根本的危机。而19世纪末开始登上思想史舞台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则从中看出，这场危机表面上是学科危机，实际上是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的全面危机。在“跟着感觉走”的经验主义影响冲击下，欧洲人一度稳定的价值系统为相对主义的各种世界观所取代，科学失去了基础，人们的生活失去了方向。然而，危机也激发了思考，孕育了生机。正是这场危机引发的思想震荡打破了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兴起了对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进行清算和批判的思想热潮，推动了西方哲学和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自然科学及其世界观的全面反思，对科

学主义局限性的揭示，对人文学科的独特对象与价值的发现和论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是这场文化变革中的重要内容。

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独立的研究对象，有无非它处理不可的问题。人文学科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专属领地？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问法就是，科学是万能的吗？科学能处理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吗？对此，早在18世纪，康德就已给出了回答。

康德是传统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分水岭，时间上晚于康德的黑格尔反而不是，原因就在于康德提出的“重建形而上学”的任务，包涵了反对科学主义的任务，他的哲学本质上是人本主义的。康德认为，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割裂的二元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思维对象的精密确定是近代哲学和科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这一思维方式既是近代科学迅速崛起的内在根据，也是导致科学霸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正如后来胡塞尔所分析的那样：

“伽利略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做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①问题是，这个对象真的那么“纯粹”吗？事实不是。康德发现，认识对象不是在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摆在那里了，而是在认识活动中生成或建构起来的。对象的生成有两方面来源，其一是“物自体”（“纯粹物体”）作用于感官得到的感性表象，其二是我们的先天认识形式，感官只提供散乱的材料，要形成完整统一的对象，还需要主体先天直观形式的安排和知性思维方式的综合统一。在认识过程中，主体首先使用存在于自身之中的直观形式接纳和安排感觉到的材料以形成感性表象，然后经过知性思维的综合连接，给它们以统一性和规律，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一切必然性，绝无例外，皆根据于先验的条件。因此，在我们所有的经验对象中，势必有先验的意识统一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思维任何直观对象。”^②在康德这里，认识对象不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纯粹物体”），而是包含主体性因素在其中的对象意识，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即在对象的生成过程中，主体性因素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动。主体靠内在于自身的先天认识形式，把多样性的感性材料综合统一于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形式之下，从而构成了科学知识，因此，在人的理性和自然的关系上，不是自然牵着理性走，不是理性到自然中去寻找法则，而是理性为自然立法。

①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著《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② 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9页。

康德哲学在认识论上的任务是解决近代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要弄清科学知识究竟是什么。康德的先验意识学说表明，主体性是所有必然性的源泉，因而是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源泉。在现代科学和哲学中，主体性因素在知识和思想构建中的作用已经是一个常识性问题。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表明，主体对客体的时空特性的认识，受制于主体对参照系的选择，受制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爱因斯坦认为，马赫的实证主义哲学的缺陷在于，把科学理论仅仅看成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而没有看到思维的自由构造在科学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量子力学则提示人们，在对微观客体的认识中不可能排除主体操作活动和观测工具的影响，因为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微观粒子的行为，只能在人工安排的特定条件下进行观测，因而观测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干扰。因此，量子理论所描述的是观测过程中主客体的整体行为，而非独立于观测者和仪器的“纯粹物体”。现代科学哲学还发现，观察和实验都离不开理论，认为科学从纯观察开始是荒谬的，观察者的已有观念或“先入之见”渗透到了从观察到形成假说的全过程。现代解释学则证明，历来为理性所摒弃的“先见”或“偏见”实际是主体的“前理解”状态，“前理解”不仅使理解成为可能，而且在理解的每时每刻都参与其中。这种“先见”或“偏见”不但不应是理解所要排除的对象，恰恰是理解的先决条件。康德的历史功绩在于，在18世纪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大行其道的时代，就率先对其背后的自然观和世界观进行革命，并开启现代哲学观念之先河。其思想遗产包括：确立主体性原则，将自由能动的主体意识视为科学知识之源，突出了人的精神本质，进而为科学知识划定界限，防止理性以及科学越界，为自由精神留下了地盘，从而客观上，为以探索人类精神为己任的人文学科预留了空间。

康德的先验意识学说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二重本质。人既是自然存在，又是精神存在；既是感性存在，又是理性存在；既是受客观世界制约的，又是自由能动的。而在康德看来，人之为人不在于它的自然的、感性的和被决定的那一方面，而在于它精神的、自由的、能动的这一方面。康德为此所做的种种区分和剥离，如先天和后天、自由与必然、分析和综合、形式与质料、信仰与知识、科学与形而上学等，最终要实现的是人与物的区分和剥离。而在康德心目中，自由、灵魂、信仰、道德精神、形而上学等，对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而且，这些领域是科学知识不能到达的，因为知识要通过判断来表达，而判断总要涉及经验。上述问题关涉到无限，意味着终极，人不可能

形成关于它们的经验。

简单地说，对人文学科来说，康德的意义在于，他明确地说出，在客观世界之外，有一个专属于人的纯主观、纯精神领域，而且，由于它是科学知识之根，是科学知识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科学知识无力进入的一个领域。纯精神、物自体等领域不能为科学所知，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不存在，正是在被康德为防范科学入侵而封存下来的这一领域，日后的胡塞尔及其开创的现象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在胡塞尔的时代，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切心理的东西都可以还原为物质的东西，心理过程可以用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过程来作出科学的、精确的解释，于是“心物”之间的原则界限似乎真的就不存在了，精神归根结底还是物质的，可以由物质科学来揭开它的谜底。胡塞尔创建现象学的时候，面临的正是这样一条经验主义路线的挑战，其严重性在于，在历经200年对精神学科的迂回、包剿之后，经验科学现在则把手直接伸向了人的心灵、人的精神领域。胡塞尔现象学的任务就是，要用理性的、然而又是非实证科学的方式向人们说明，那个被康德封存下来的“纯精神”、“纯自我”到底是什么。现象学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纯思想性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

在1900~1901年出版的两卷本《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一反他早期所接受的经验主义立场，将“心理主义”作为主要批评对象。胡塞尔指出，“心理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当然包含了物理的、生物的过程，人的心理活动有其生理学基础，比如人的脑神经系统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心理的”东西的确可以还原为“物质的”东西。然而，“心理”的特点，不在于它的活动过程，而在于其内容，我们通常所谓的对与错，就是指“判断内容”，而不是指“判断活动”。作为生理过程，“心理活动”遵循自然规律，而“心理内容”则是思想领域里的事，遵循思想规律，二者有着原则区别。这个“内容”不是物质世界刺激的结果，而是理性主体的一种建构，是精神的创造。那么，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胡塞尔说，它是一种“意义”，我们可以从语言中发现它。

胡塞尔指出，语言符号本身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方面它是有“所指”的，指称一个具体的对象或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表达，描述一个普遍的思想。前一种作用是经验性的，具有可验证性，后一种则是思想性的，具有自明性。“所指”与对象有关，“表达”则与意义有关。比如，

“我头疼”这句话，既指我当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私人的、无法向他人传递的，然而此刻未体验到头疼的听众也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则表明这句话还有普遍知识的意义，听众可不经感觉经验而能理解。我们通常所谓“无意义”，也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对象上不允许，一种是意义上不允许。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些语句，特别是神话和小说里的语句，可能只有意义，而没有指称。例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个语句显然是有意义的，但由于“孙悟空”这个专名指的是一个虚构人物（动物），是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对象，因而不能认为这个语句具有指称。就文艺作品来说，人们关心的是语句表达的思想（意义）以及由此激起的美感，而不管它真实与否。这意味着，意义可以游离于客观对象，而具有一种独立性。意义的独立意味着精神的自由。

“所指”与客观对象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因为有这样一个对象存在，所以语词才能有所指。然而，意义与客观对象的关系就不是这样一种事实的关系，毋宁说，这是一种纯观念性、纯思想性关系。在意义世界里，主体与客体、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都与感性经验世界很不相同，在这个世界中，思想与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关系，对象的意义是主体赋予的，意义的真实是思想的真实，是主体的“真实想法”或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在感觉经验中，对象是主动的，感觉经验的真实与否，要有赖于客观对象是否真实存在。正是主体内心涌动、涌现的“意义”，而不是客观对象刺激形成的“感性表象”构成了人的内心世界，它不同于客观的、可数量化描述的因而也是僵死的（既定的）“事实世界”，而是鲜活的、自由能动的精神世界。探索这个世界的任务不能属于以既定事实为对象的“科学”，它应属于精神科学。

胡塞尔对意义的认识来自他从传统西方哲学发掘出来并经由他精心打造的“意向性”理论，这是一种关于意识的学说。胡塞尔认为，“意向性”是人的意识活动的根本特征，一切意识均是对某物的意识，不管这个“某物”是否实际存在，自我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指向它、涵盖它，“意识某物”是意识的基本结构。意识就意味着“意识什么”，意识不是一个静待外部材料来填充的空壳，而是一开始就是有内容的，意识的内容和对象与意识本身，或者说存在与思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意识的这一“不需假以外物”的先验性、自足性特征，我们就得承认，凡是对我们的意识呈现出来的东西，或者说，凡是我们想到的东西，作为意向对象，都是同样合理的，都

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象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物，可以想象上帝的存在，可以想象一个“至大无外”的包含整个世界于其中的“大全”，也可以想象一个“至小无内”的原子，可以塑造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作家心目中的文学形象，也可以在永远不会完美的现实世界之外设想出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于是，意识的对象可以“有名无实”，“名实”可以相分、相异。正因为“名实不符”，因为“名至而实不归”，人们才有目标，进而有行动，有革命和改良，有创造和超越，也因而才有了不同于动物自然进化史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这样的一种意识对象，实际是人的精神创造物，是思想性存在，而非现实存在，它不是物质性的，而只是代表一种“价值”，是思想本身为从绝对性、普遍性角度把握世界而设定的一种对象。对这种对象的认识与对物质对象的认识，有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规律，原来对立着的双方，无不得到最终的、绝对的、直接的统一。这是一种理想性存在（理念），其本质不是由作为思维中介的概念来把握的，而是意识直接“呈现”或“显现”出来的，因此，这种存在与其本质是直接统一的；这是一种想象的存在。思维与存在，思想与思想构建的对象是直接统一的；对这种对象的认识，没有感觉，可以理解，没有表象，可以思维，所以，普遍与个别是直接统一的；在这种对象身上，现象与本质之间不存在一层帷幕，事物的“显现”不仅是对感官，而且也是对意识的“显现”，现象就是事物本身，因此，现象与本质是直接统一的，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

胡塞尔认为，这个由意义或思想性存在所构成的世界，其内容和规律都大不同于那个物质的、可量化的既定事实的世界，这是一个具有能动意识的活生生的人的世界，实证科学不适用于这个世界，适用于这个世界的唯有“人文科学”，哲学现象学就是这样一种“人文科学”。在胡塞尔看来，哲学按其本性，一定是先验主义的，但历史上的先验哲学，包括笛卡尔和康德，都不彻底，他们都摆脱不了“心物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只有现象学才把欧洲哲学中的先验主义贯彻到底，“心”才完全摆脱“物”而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这就是人文科学。欧洲文明近代以来的危机，症结在于以“自然科学的态度”代替了“人文科学的态度”，混淆了这两门学科的特点。现在到了要正本清源的时候，对“人文科学”的向往和自觉追求应重新成为欧洲文明的核心部分。

如果说康德哲学在认识论上的主题是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那么胡

塞尔的现象学则回答了人文学科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表明，自我确非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精神领域确非科学所能进入。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明确揭示出了那个“纯自我”、“纯精神”到底是什么，它与物质世界到底有何不同，人文学科究竟是如何运思的。进而，胡塞尔表明，人文学科有自己独立的对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而且由于人文学科以人的意识、精神和心灵为对象，以对人类生活的总体把握为旨归，事关价值与伦理目标，是科学和人类其他一切活动最终都不得不问的终极问题，其对于人类文明和人类生活的意义就更为基础和根本。

“从来的先验哲学都是要为知识或世界找基础，但最后都证明自己还缺乏基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这样，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这样。”^①胡塞尔现象学立论的基础是普遍的先验主体性，而这一立场本身是需要辩护的。由于要恪守这一立场，胡塞尔在循序渐进地深化自己思想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惑并留下了只能等待后来的现象学家去化解和处理的问题，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都无法避免的，否则思想也就完结了。作为阅读者和思考者，我们更应关心的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所发明的极富启示意义的运思方法。不可否认，胡塞尔在完成从经验主义到先验主义的转变之后，一生都走在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道路上，既要反对走经验主义路线的科学主义，又要同传统人文学科内部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积习做斗争，以普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态度；以普遍理性的立场，而不是工具理性的立场，全力推进哲学及人文学科的科学化，使人文学科的地位及价值，获得了不仅是情感上的认同和支持，而且是逻辑上和学理上的有效辩护和论证。现象学是20世纪最富生命力的哲学运动之一，从海德格到萨特，从存在主义到解释学都可视为这场运动的成果，而且其影响越出哲学遍及人文各科，至今不衰，成为20世纪西方人文学术复兴的重要思想源头，其现实效应已经惠及到了西方文明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本书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来说，现象学及其效应，不仅为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有效辩护，而且为基于人文学科的人文教育的必要性给出了哲学的、因而是本源性的理由。

从现代大学发展史来看，重视人文学科建设、重视由阅读经典而形成的人文教育是那些世界名校得以成功的关键。在我国，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在十几年前就已提出，呼唤真正大学精神的声音也一直不断。虽然大学的治理涉及从国家的教育方针到管理体制、办学理念再到培养方案等多个方面，

①张汝伦著《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

这其中有很多一时还难以理清的分歧和争议，但是，对人文学科独特价值的认识，对经典阅读的意义，以及对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都不应该再有怀疑，而且要有切实的措施和行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校以来就十分重视对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20多年来，尽管专业数量大幅增加，培养方案年年修订，但对通识类、人文类课程在学分、学时上的比重都一直予以充分的保障，并通过大量的讲座、读书沙龙等方式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营造读书氛围。重视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20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重要传统，也是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获得好评的重要经验。本书作者均是我校耕耘在人文学科各领域的好老师，他（她）们中，既有年逾古稀的资深学者，也有刚及而立之年的学术新秀，更有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需要提到的是，作者中还有于2006年11月1日以51岁的盛年而不幸患病去世的吴小龙老师。小龙老师学术造诣深厚，讲课出神入化，他开设的《中国通史》等课程堂堂爆满，受到各专业学生们的欢迎。他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对学生满怀责任和爱心，他的学生和我们这些同事们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收录到本书中的各位老师文章，或解读名著名篇，或畅谈读书治学之道，是老师们积多年读书、教书乃至人生经验之所得，都在心底酝酿、积淀已久，不吐不快，这才有了书中各篇文字。我相信，课堂之外读一读本书，听听老师们的心里话，一定会有益于青年学生们的读书与生活。

目 录

人文经典、人文学科与人文教育（代序）

王义军

I 文学篇

- | | | |
|----|----------------------|-----|
| 3 | 封建主义“现代化”的畸形儿 | 雷永生 |
| 12 | 资本主义：从精神气质到物质消费 | 张 跣 |
| 25 | 由“抄检大观园”看《红楼梦》中的闺阁政治 | 于闽梅 |
| 42 | 近现代学术脉络中的读书人 | 曾祥波 |
| 52 | 读小说笔记 | 张卫民 |
| 66 | 经典不是时光的奴隶 | 徐先艳 |

II 史学篇

- | | | |
|-----|--------------|-----|
| 81 | 回望法国大革命 | 王 文 |
| 92 | 走进历史学家的世界 | 向 静 |
| 104 | 重读玻恩：人类的希望何在 | 吴小龙 |
| 111 | “巨变”前的忧思 | 吴小龙 |
| 119 | 无声的历史及其言说 | 黄皖毅 |

III 哲学篇

- | | | |
|-----|--------------|-----|
| 133 | 我们究竟怎样对待经典？ | 雷永生 |
| 140 | 爱的升华与冲突 | 赖辉亮 |
| 147 | 苏格拉底的生与死 | 赖辉亮 |
| 160 | 多元汇聚的信息技术决定论 | 肖 峰 |
| 174 | 我看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 包锡妹 |
| 183 | 后 记 | |



文学篇

